

# 浅议红军长征过广西的民族政策

甘鹏飞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主要体现于如何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实中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如何将具有中国民族问题特点的实际的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探索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少数民族;民族习惯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6.1535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认识是逐渐加深,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移植”前苏联解决民族问题模式。土地革命时期,因教条主义在党内占领导地位,机械执行共产国际命令和照搬苏联模式。“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sup>[1]</sup>,这是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提到。此外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中也提出相似的政策内容:“党必须领导少数民族解放与自立(包括分立权)而斗争。”<sup>[2]</sup>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虽然重点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但已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但只从属于政治工作,必须要对付得好,但是民族工作没有注意调动少数民族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已注意到,制定民族政策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少数民族问题,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党支部都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sup>[3]</sup>这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1929年6月25日讨论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平等原则,“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sup>[4]</sup>这是1931我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维护各民族的权利。

总而言之,党在红军长征前的民族政策,“移植”了前苏联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这与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工作都需要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指导有关。这种认知也仅限于理论上探索,在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前,并没有机会真正实践。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前,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原和东南一带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远离党的工作区域中心,民族问题重要性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直到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后,才第一次真正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

## 二、现实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诉求

红军长征过广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入少数民族居

住地。当时桂北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多路少,地形复杂,整体经济、文化都落后于汉族聚居区,有些地区还保留在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甚至是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传统上受到统治阶级代表——大地主、土司、官僚、军阀等的剥削和压迫,当在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桂北各个民族之间,红军长征前,民族隔阂严重,矛盾频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实行民族的歧视政策,也就是扶持某一个民族同时压迫其他世居民族,国民党桂系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特别是1933年的瑶民起义,被汉族封建地主勾结地方军阀镇压,手段残暴,国民党统治者的恶劣行径,增加了民族隔阂,老百姓对于封建统治者更加恨之入骨,视军队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而不及。

还有,中国共产党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土地革命前期,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不加区别实行“富农不分田,地主分坏田”,还将少数民族上层一律视为反动势力,结果是吓跑了中间派,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

此外,国民党在红军进入广西前,还进行负面宣传,误导群众,诋毁党的政策,并要求当地老乡把家里的财物、食物藏好,上山躲避,此外还到处张贴各种标语,发放传单,教唆民众拒绝和红军合作。

这给红军造成红军政治宣传上困难,而且也在经济上带来极大的困难,红军部队的给养都成了问题。国民党在后面“围剿”阻截,这个时候,要争取群众的支持,无疑是红军湘江突围成功的前提条件。为了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1934年11月19日红军政治部特别在少数民族工作中做出针对性措施,指出今后野战军应该把少数民族的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后部队的转移和作战的任务的成功,这任务能不能成功,又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成功有着决定的意义。因此民族问题直接影响到党的工作重点即军事斗争,这使得民族工作提到了日程上来。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的早期实践与探索

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并开始实践与探索,在广西实行民族政策是努力探索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实行民族政策体现于红军长征过广西时,散发的相关宣传资料和针对广西

桂北地区民族实际情况，并体现在针对该地区制定的《对苗瑶民的口号》和《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相关政策内容上。

这两个关于当地民族政策意见是红军总政治部于湘江战役最关键三天时间里，即1934年11月29日发出。回顾湘江战役在1934年11月25日发起，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是这场战役决胜的关键时间点，在这三天里我军在三个决定战役走向的关键地区投入强大的力量，即是光华铺、新圩、脚山铺进行阻击敌人主力部队。红军在战役关键时间点还关注民族问题，由此可见民族问题解决与红军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当然，这两个指示并不是在红军一进入广西或之前就发布了，说明是红军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做了针对性布置。

#### （一）注重对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早说过：“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前提条件。党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必须和具体实际结合，要做到深入的调查研究，注意与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结合。

#### （二）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自决

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平等，认为民族有大小之分，社会制度有先进与落后，但绝无优劣和贵贱区别。列宁曾说：“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对民族平等原则支持，并在广西的民族工作中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意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指出汉族劳苦群众与各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敌人，必须协力同心，联合起来获得彻底解放。

中国共产党为了消灭民族内部阶级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比如红三军团第四师部队领导和瑶民起义的带头人杨进禄等见面并帮助他们分析对敌人斗争失败的原因和以后的策略问题，并赠送武器。现在在瑶民起义的龙胜县还有红军当年留下标语，标语内容为：“红军绝对保护瑶民”和“继续斗争，再寻光明”。

可见，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首先要解放被压迫民族，同时与大汉族主义进行斗争，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我军坚决反对的。这时红军的民族政策，让各民族认清共同敌人，消除了民族隔阂，增加民族的认同感，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过度到大中华民族，为红军胜利渡江，红军长征胜利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 （三）承认民族差别，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一般事物认识指出他们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共性指出事物具有的普遍性，个性指出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不同属性，也就是个体所特有的特征。任何事物都有共性的一面，体现共同体的类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任何事物都具有个性差异，这就决定了世界的多样性。民族作为一

个共同体，具有共同语言、文化、经济等，是其共性的体现，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文化、经济等，各民族差异性的存在，体现了民族的多样性。

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实践中，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既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原则，又注意实践工作的灵活性，改变了在红军长征前，不考虑少数民族实际情况，把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以免打击少数民族革命积极分子。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民俗与习惯，红军严明的纪律，买东西必须使用银元或铜板，不能用苏维埃纸币；买粮食只许买杂粮不给买大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群众打扫、捆柴、挑水等。

#### （四）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1934年，红军长征进入广西后，根据桂北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党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瑶、苗民族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内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对少数民族的实际领导层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团结一致的策略。

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出对待少数民族领导层，尤其是对那些内部还是权威人物，要与他们打好关系，才能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这些地区以及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且，还应该看到他们也有同情革命性的倾向，因为他们也在领导广大的瑶民群众和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在做斗争，这种抗争是民族的觉醒。由于少数民族领导层所具有本民族的权威性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性，中国共产党政策是联合和团结。争取形成利益。

可见，党的民族政策在广西发生了重大转变，由长征前视一切少数民族上层为反动势力到争取和联合少数民族上层，这是统一战线组成变化，由长征前只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下层建立统一战线，到认识到少数民族上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联合他们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

#### 参考文献

-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8.
-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8.
- [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109.
-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0.

#### 作者简介：

甘鹏飞，男，助理研究员，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